

论历史研究中的 整体方法 —— 发展的哲学

金观涛 著
刘青峰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K061
14
2

8095/08

三原色丛书

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 发 展 的 哲 学 ——论“矛盾”、“悖论”和“不确定性”

金 涛 峰 著
刘 青 峰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B 562789

责任编辑：何 越
封面设计：高尚德
版面设计：惠红彦

148

《三原色丛书》

• 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 •

• 发展的哲学 •

金观涛 刘青峰 著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窄 32 开本 4.75 印张 2 插页 6.8 万字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69-0223-9/Z·20

定价：1.25 元

《三原色丛书》编委会

1988年

主 编：董光壁

副主编：李醒民 雷抒雁 李伯聪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大明 孙玉麟 仲维光

刘 黄 朱壮涌 李伯聪

李醒民 李鹏程 何 越

张志铭 赵雷进 徐 兰

董光壁 雷抒雁

本书责任编辑：赵雷进

●●●序《三原色丛书》

雷抒雁

古训已在泥土中枯萎
格言也已疲惫

飞船却抖动丰满的羽毛
在新的空间浪迹

色彩、音符、文字
终于变得扑朔迷离

电子以无弦的琴
演奏辉煌的乐章

金属的反光
成了舞伴愉快的刺激

谁能捕捉灵魂深处的惶惑
深重如山的孤独的诗意

诸神又将归于一元
每个谜都遭到千百次通缉

三原色不再是最初的阶梯
高度的复杂反而又单纯如一

每种色彩都是一段演变过程
都有着痛苦的不凡的经历

用宇宙作我们的话题
也许，每一粒星尘都会使你惊奇

1987年11月 北京●●●●

目 录

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

金观涛 刘青峰	[1]●
历史研究中的“歧路花园”	[3]●
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稳态” 分析	[10]●
马克思、帕森斯和所谓的历史 控制论	[22]●
结构主义的困境	[31]●
异化机制：社会结构稳态的 破坏	[38]●
结构和非结构以及社会结构 的容量	[49]●
社会结构演化的四种模式	[56]●
结束语：生活在历史中的历 史学家	[73]●

目 录

发展的哲学

——论“矛盾”、“悖论”和“不确定性”	金观涛	[89]●
从“无矛盾原理”的争论谈起		[91]●
“矛盾”概念的精确化；悖论对逻辑的破坏		[95]●
科学理论纠错机制和集合论悖论的启示		[100]●
不确定性和系统内部调节功能的破坏		[107]●
无限、量子力学和信息论		[112]●
数学家和哲学家共同的成果：歌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122]●
系统演化理论		[131]●

论历史研究中的 整体方法

金观涛 刘青峰



我想象它建立在
神秘的山巅……，我
想象它隐没在稻田之
中或水底下，我想象
它是无限大的，不只
是有八角形的亭台楼
阁，而且还有河流、
省区、王国。这是一座
迷宫中的迷宫……，
一座蜿蜒迂迴、永远
扩展着的迷宫。

——波赫士：《歧路花园》



历史研究中的“歧路花园”

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家是不幸的。科学及科学规范毫不留情地占据、切割着历史学研究的固有领地。本世纪上半叶，年鉴学派的大师们在深感史学理论和方法危机的情况下，自觉地接受了挑战，在追求整体性历史研究中开辟了新路。学者们在经济史、人口社会史、城市及区域发展史等领域中努力创造与自然科学规范接近的社会科学。数十年来，这种努力获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在这一追求过程中人们又逐渐认识到，这是一条

艰巨而又布满陷阱的研究之路。这使得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家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们必须遵循科学规范的实证和清晰性的要求，使得他们倾向于寻找具体而又细小的题目；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不但掌握起来有巨大困难，而且还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这又促使他们向传统的史学方面（包括考据方法）倒退。为了掩盖这种倒退，他们不得不在这些细微琐碎的小题目上给出点类似于“小玩意儿”的理论解释。但是，历史研究的危机加之于历史学家心理上的负担是如此沉重，使他们不得不时常声明历史是处于科学和艺术之间的中立地位，来为自己寻找立足之地。可悲的是，他们却同时受到科学家、哲学家的攻击，受到文学艺术家的嘲笑。^{〔1〕}

在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完全应该遵守科学逻辑的制约。早在1942年，著名科学哲学家亨佩尔（Carl·G·Hempel）发表了一篇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论文：《历史中普遍定理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2〕}这篇论文明确指出，历史解释和科学解释在原则上（也即方法论上）并无不同，因而可以把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系统地引

入历史研究。

亨佩尔论证道：在历史学研究中，我们解释事件Y为什么发生时，通常总是指出促使事件Y发生的另一事件X（或事件组），接着阐明X和Y之间联系的普遍有效性，这样才算解释了历史事件Y。他指出，这种方法和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分析完全一致。因为X在时间上早于Y，相当于原因，X导致Y的一般规则就是普遍因果律。

因此，亨佩尔用分析哲学的形式把历史研究的逻辑表现为如下格式：

$$(1) C_1, C_2, C_3, \dots, C_n \quad n \geq 1$$

$$(2) L_1, L_2, L_3, \dots, L_m \quad m \geq 1$$

$$(3) E$$

其中， $C_1, C_2, C_3, \dots, C_n$ 是条件组， $L_1, L_2, L_3, \dots, L_m$ 是普遍规律，E是被解释的事件。五十年代后，亨佩尔又把概率解释补充到他的历史解释模式中来，企图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一套符合科学规范的新研究方法。

亨佩尔的论文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持久争议。在历史学家看来，亨佩尔机智地指出了历史解释和科学解释的相似性是有启发的，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则在历史研究中是不成功的。

最多的也是最苛刻的批评是，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完全不同，所以不能生硬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这里，我们暂且不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拿方法实际应用的情况来说，亨佩尔简洁漂亮的逻辑对于分析社会复杂历史事件，却显得是隔靴搔痒，无法实施。

确实，大多数理论历史学家在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时，或者从某种比较研究中企图概括出几点普遍规律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亨佩尔的分析模式。但是，历史研究的困难并不在于历史学家是否在理论上承认并愿意应用这种模式，而在于如下两点：

第一，那些作为原因（或称条件）的先行事项往往无限多，不可穷尽；

第二，历史研究中，条件组C也是某些事件（或现象），而作为结果的事件组E往往可以反过来影响C，这也就是历史研究中往往一经陷入就难以自拔的因果循环网。

表面上看，在亨佩尔的模式中，E在时间序列上处于C之后，一般是不能影响C的。而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如果要从事件分析中抽象出因果联系L，那么C和E往往不是某种独一无二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某同类事件（或

现象)。这样，在个别事例中，E又完全可能反过来成为C的条件^{〔3〕}。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困难恰恰在于分析事件之间的联系时，我们怎样去处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张巨大而又因果交错的事件（现象）网络。

以分析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为例，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E，几乎可以找到无穷多的原因。仅就较重大的原因而论，一位历史学家就列举了十三个之多：兵穷黩武、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农业衰落、奴隶制度、民众贫困、地主贵族发财、资金减少、庇护制成长、公德丧失、血统混杂，等等^{〔4〕}。甚至有的研究者还说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贵族用铅容器饮酒的习惯有关。列举再多的原因，对于我们寻找普遍联系L是否有益是大可怀疑的。正如汤普逊在列举了上述原因后，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上面提及的每一个原因，都是从其他原因或条件得来的。人口减少，是原因还是结果？贫困，是原因还是结果？亨利·缅因勋爵说：‘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即赋税过重使罗马帝国贫困化的说法，更加荒诞无稽。’农业衰落是因为地力枯竭呢？还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赋税负担过重和农业投资的递

减？还是因为地主贵族占夺土地使农民沦为农奴地位呢？还是因为乡村不靖和强盗横行？”〔5〕

这一例也许可以表明，亨佩尔式的逻辑的和实证的分析方法对于某些复杂历史现象的研究来说，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每一种因果逻辑分析都可能把我们卷入一张日益扩张着的深不可测的联系网络之中。我们仿佛走进了波赫士根据红楼梦大观园而想象出来的那个歧路之中再生歧路的迷宫花园。每一种原因都仿佛是一条小径，它幽深神秘，似乎能通向某种解释的真理。但研究者顺着它走下去，往往不知在什么路口就迷失方向了。

我们能够从历史研究的歧路花园中走出来吗？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年鉴学派兴起后，这个问题异常尖锐地摆到历史学家面前，人们越来越重视历史的整体性研究。但富有戏剧性的是，人们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现象，就不得不借助于大量数据的收集、整理，用计算机和各种复杂的数学方法处理这些数据，得出一些相关分析来，这种陷于数据收集和处理的 research 方法和过程，又迫使研究者在对细节和数字的微小差别上的兴趣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这样，对这具有无限丰富细节的研究进行综合也就愈

加困难。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历史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目标而发展起来的新方法，反而导致了否定原有目标的趋向。这种富有讽刺意义的现象，迫使现在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一步从方法论上反省：怎样在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过程中，解决亨佩尔命题所面临的分析复杂的互为因果的网络的严重挑战。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评价各学派和学者作出的有关理论研究，而是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近年来，我们以及我们的合作者，相继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悲壮的衰落——古埃及社会的兴亡》^{〔6〕}等著作中，进行这种方法论的尝试。我们探索的出发点是，试图利用系统的组织演化理论来分析讨论中国古代帝国时代的社会结构、^{〔7〕}西欧封建社会及古埃及社会的结构，以及这些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宏观变化过程。

《兴盛与危机》一书出版之后，它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和议论。这些议论中最有趣的现象莫过于，国内某些人指责我们的研究代表了历史研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搞的